

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新探

——基于劳动与财产权关系变革的视角

姜越亚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对于“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学术问题,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诠释与解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目前几种影响较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进行分析和考察,有利于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性。从劳动和财产权关系变革的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基本原则的有益选择。在马克思论证“两个必然”的实现过程中,劳动与财产权关系的变革是一个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转化动力,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起源;劳动和财产权关系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1-0010-05

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研究成果表明,各方的研究都是从经济、文化等角度探寻资本主义的起源,鲜有从劳动和财产权关系变革的角度来探寻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单一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它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向商品的转化,还实现了货币的增殖,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现实剖析,充分说明了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在实现“两个必然”的过程中,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动力作用。

一、对几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的考察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除了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商业化模式起源说外,还有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起源说,以及埃伦·米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资本主义农业起源说。这些研究都有自己

的特点和值得关注的亮点,但它们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析都存在一定的争议。

(一)商业化模式起源说:商业贸易与市场

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是商业贸易的自然结果,当市场被从古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且当贸易机会因某种原因而随之扩大时,资本主义方才出现。从这一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争论:首先,这一解释建立在贸易与市场的形成具有延续性的假设之上,而这种贸易与市场的连续性是否真的能够一直存在有待证实;其次,在这一解释中,亚当·斯密并未将资本主义的起源视为一种性质转变的重大社会转型,而仅仅将它看作“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商业活动形式,即将市场的扩大、财富量的增加以及经济生活商业化特征加强看作资本主义的产生;再次,商业化模式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独特的必要性,不承认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独特运作方式,也不承认市场的独特运动规律竞争、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迫使人们进入市场,将剩余财富重新投资,并通过改进劳动生产率进行有效生产;最后,商业化模式起源说没有对当时独特的社会财产关系进行分析,而只看到了剥削。

(二)精神起源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和桑巴特将资本主义看作一种理

收稿日期:2019-08-14

作者简介:姜越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性的经济活动,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合乎人理性的行为,是追求利润的趋利社会系统。所以,他们创造性地从资本主义活动背后的精神理论出发,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1]这种将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面对这些争议,一方面,应当肯定16、17世纪的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的较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一理论存在的如下不足:第一,它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就唯物史观而言,资本主义的产生的确需要精神动力,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经济动力的驱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替代的因素。第二,“‘资本主义精神’说无法涵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2],无法解释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等地区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三)资本主义农业起源说:资本主义农业与经济契约

艾伦·米克辛斯·伍德在批判资本主义起源人口说、绝对主义国家说以及商业化解释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起源于英格兰的领主将经济契约强加给租地农民的行为。她认为,人类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被分为农业生产者和劳动成果的占有者。虽然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的分离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是农民一定是直接生产者,因为只有农民才掌握着生产工具和土地,而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仅仅是用其拥有的超经济的手段军事、司法和政治特权等来剥削他们。她在继承布伦纳(Robert Brunner)的资本主义起源学说的基础上,解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的特殊性——强制。她认为,“对市场的依赖导致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不可替代的角色,不仅作为交换或分配的机制,而且也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支配者和管理者。”^[3]资本主义仅仅是封建制度发展的结果之一,只有当强制市场出现时即资本的积累、殖民以及追求财富最大化时,资本主义才会产生。只有当社会中的一切都依赖于市场,为市场而生产,市场在社会中起决定作用时,资本主义才会产生。伍德的资本主义农业起源理论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识到了资本主义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中产生的。但在对资本主义农业起源的探索中,她更多地停留在对农业现象

和表象的分析,未能深入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实质——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另外,伍德在对资本主义起源探究的整个过程中,存在“欧洲中心论”的强烈色彩,对非欧洲国家资本主义起源的考察不足。

虽然以上三种资本主义起源说都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这些探讨为从新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提供了两大启示: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包括商业发展、农业发展、精神萌芽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资本主义最初是作为某种(某些)“要素”孕育于封建社会的母体之内,而后通过一定的条件或动力成长起来的,探究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就在于找到促进这些要素转化的条件或动力。

根据马克思“生产方式历史演进说”中所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4],那么封建社会中需要解放的要素就是那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但又孕育于封建社会之中的雇佣关系、资本、自由劳动力等。导致封建社会中这些“资本主义要素”发生转化的条件就是封建社会内部发生的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

二、劳动与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中的角色扮演

在明确“财产权”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和“劳动”内涵的关系性存在的基础上,从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对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分析来说明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中的关键作用,对人们理解资本主义起源表象下的规律性和实质性的原因有重要意义。

(一)“财产权”概念的历史性演变与“劳动”内涵的关系性存在

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者已经对“财产”问题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但在他们的语境中,“财产与权利是分开讨论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财产权’概念”^[5]。兰盖在《民法论》中就曾指出:“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活路,我们的短工才不得不耕种土地而自己享受不到它的果实,我们的石匠才不得不修建房屋而自己不能居住。”^{[6]369}可见,兰盖已经认识到贫困迫使丧失生产条件的工人为了物质生活资料,不断地创造他人的财产,但由于实体性思维方式的局限,他并没有直接表述出“财产权”,而是用“财产”这一实体性概念代替了“财产权”这一关系性概念,也未

能进一步阐释劳动和财产权的这种分离所带来的后果。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财产权是财产增殖的基础。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在《贸易论》中就曾明确指出:“只有财产正在增长的人才是最富的人,不管他的财产是租出去的土地,还是放出去生息的货币,还是投入商业的货物。”^{[6]397}贝勒斯(John Belles)也在《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中坦言:“货币只有放出去才能增殖,才有用处。”^{[6]397}可见,早期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财产权是富人能够占有穷人劳动成果的根源,财产权是财产增殖的基础,但他们对财产权的讨论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现象,将财产与权利分开讨论,没有形成完整的“财产权”概念。

“财产权”概念的真正提出者是17世纪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洛克在其《政府论》中通过产权理论对劳动和财产权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上帝将整个世界赐予众生所共有”^[7]的观点。他认为,私有的、个体的财产是一种上帝赐予的自然权利,人的财产不仅包括自己的身体,而且包括通过人身体进行的劳动。因此,当一个人将其劳动与其他事物混合即通过劳动改变该事物的自然状态或自然属性时,他关于财产的自然权利就随即被确立。也就是说,是劳动使人将原来的共有的状态变为了私有,是劳动使私人所有权产生。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就是使财产从共有的状态变为私人占有的状态,而导致这种变革发生的原因就是人的劳动。如果将这种财产权关系的变革更加精确化,就可以表述为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

马克思在批判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中引申出“财产权”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入手,借助异化劳动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局限性进行深刻分析的同时,也指明了封建社会内部劳动和财产权关系变革的实质。他指出,私有财产的三种分配形式(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三种所有权(劳动、资本和地产)相互分离的结果^[8],即劳动者和生产工具、劳动者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者和土地的分离,就是封建社会内部劳动和财产权关系变革的实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二) 劳动与财产权关系的变革促成资本主义两大因素的转化

一是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使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奠定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

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三大条件如下:第一,货币所有者能在市场上找到这种“特殊商品”,即存在供劳动力买卖的市场;第二,“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9]292},即劳动者的劳动力必须与生产资料分离;第三,“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自由的的所有者”^{[9]292},即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必须分离。通过对这三大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市场的形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还是劳动力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都是封建社会内部发生劳动和财产权关系变革的结果。正是这一变革使农民和土地、生产工具及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被迫陷入了丧失生产条件的贫困状态。这时,农民的劳动和生产资料已经分离。他们为了维持自身和家人的基本生存,不得不进入工厂出卖自己的劳动。此时,货币所有者就已经能够在市场上找到这一“特殊商品”,并通过支付货币的方式,使劳动力的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归自己所有。至此,工人劳动力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

二是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推动货币转化为资本,奠定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资本,它的产生与封建社会内部的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密切相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明确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问题,是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作为前提。”^{[9]94}只有使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具有价值增殖的功能,才能转化为资本。由于农村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一方面,农民逐渐失去土地、生产工具以及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得不沦为佃农或雇佣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就为货币转化为资本提供了价值增值载体,另一方面,封建领主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生产资料和货币逐渐集中在这些少数人手中,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地租作为封建领主财富的重要来源,为了实现它的增殖、获取更多的利润,各封建领主就加大对租佃其土地的农户的剥削,鼓励甚至迫使他们想尽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租种土地的佃农为了生存,不得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这样,封建社会内部就出现越来越多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生产资料和货币的增殖,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三）一个典型的代表：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英国作为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何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呢？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实现了促进资本主义因素转化的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早在16世纪，英国农业的发展条件至少在某些特定区域已经日趋整合，他们采用“进步”的方式促进了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的提高。这种“进步”的方式不仅仅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思想和制度的进步。

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封建领主以及租赁其土地的资本主义式的佃户要求废除阻碍土地生产率最大化的旧有习俗和生产实践。譬如，废除阻碍私有产权发展的乡村社群会和社群会专门保留的一些土地，废除必须给予非产权持有者在他人土地上的一定使用特权，废除给予小所有者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条件下的习俗性产权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变革农村的劳动与财产权关系、变革原有的阻碍资本主义积累的劳动和财产权制度，主张以排他性的私有产权来对抗有争议的共有土地产权。

另一方面，英国通过圈地和回收利用未开垦的土地，而赋予土地更高的生产率和收益率。从表面上看，“圈地运动”是简单的在共有土地或英国乡村特有的“公共领地”上插上藩篱，但究其实质，是对农村多数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共有和习俗使用权的彻底废除，是大地主试图将平民驱离土地，将其改造成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牧羊场。在此基础上，英国又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变革成果。英国议会承诺国家将不再对“圈地运动”进行干预，并在18世纪将“议会圈地”运动以法案的形式确立。至此，英国彻底废除了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旧有财产权关系。由此可见，这一“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实际上就是对英国农村原有的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瓦解，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原始财富的积累和自由的劳动力。

三、劳动与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在“两个必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对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在实现“两个必然”中的作用早有论述，他主张通过重建“个人所有制”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一）实现“两个必然”的关键——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

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

书摘要》中，对古代氏族进行研究时，就已经明确肯定了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梭伦允许财产的拥有者如无子女可以立下遗嘱来处理财产，这样就第一次侵犯了氏族的财产权。”^[10]在这里，个人从氏族手里夺取了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使财产权由氏族向个人转移，劳动和财产权的关系发生变化，社会由原始社会发展为奴隶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探究，论证了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马克思通过对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构想，肯定了劳动和财产权关系变革在实现“两个必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肯定了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在消灭土地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联合”生产中的作用。他指出：“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而是扬弃整个土地私有制。”^[11]对土地私有制的扬弃，本质上就是使垄断不断扩大化、普遍化直至消失。通过消灭土地的垄断模式，“联合占有土地”，使人人都能享受到“联合生产”带来的经济效应，从而推动共产主义的实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两大因素，即“无产阶级本身”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而促使这两大因素不断发展，最终实现性质转化的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使劳动者和土地、劳动工具以及劳动产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离状态逐步走向自由的统一，从而不断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促进生产力发展。

（二）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劳动和财产权关系变革的关键——“重建个人所有制”

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的关键在于重建个人所有制。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马克思就已明确提出要建立“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的设想，主张社会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物质生产资料。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的分析，再一次表达了要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协作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更进一步强调了要把“个人所有制”变为现实的愿望。他要求通过剥夺剥夺者，“把现在主要用作奴

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12]。

虽然马克思并未提出具体措施来重建个人所有制,但根据其经典著作中对实现个人所有制的构想,可以将如何实现个人所有制的建构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要实现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自由,即通过缩短工作日、让劳动者自由决定劳动时间等措施,使劳动时间重新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使劳动者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其次,要实现自由劳动者对土地的联合占有。通过对“土地垄断模式的扬弃”,即消灭整个土地私有制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联合”占有土地,并且这种“联合”的实现不再借助于各种农奴制度、贵族奴隶主的权势、私有制和各种神秘主义,而是以合理、平等的方式恢复人类同土地的正常关系。再次,要实现自由劳动者对生产工具的联合占有。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型私有制,而是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消灭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统治阶级手中,实现“生产工具不再属于个人或集团所有,而属于全社会共同所有”^[13]。最后,要实现自由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真正占有。“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14]马克思所主张的是通过消灭私有制来废除那种利用占有财产支配他人劳动产品的剥削行为,从而承认劳动者个人对自己的劳动及劳动产品的财产权。

四、结语

通过对几种典型的资本主义起源学说的考察,发现可以从劳动和财产权关系变革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的起源。在梳理“财产权”概念与“劳动”内涵的关系性存在的基础上,论证了劳动和财产权关系变革作为推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作用。立足于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

劳动和财产权关系的变革在未来实现“两个必然”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为当下制定相关政策、采取具体措施来推动“两个必然”的实现确立了不容忽视的原则立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陈维纲,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42.
- [2] 蔡玉辉. 多棱镜中的历史——四种资本主义起源说评述[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73-77.
- [3] 艾伦·伍德. 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M]. 夏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0-71.
- [4] 罗节之. 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当代形态[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176.
- [5] 莫凡,谭培文. 马克思主义财产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以经典著作作为依据[J]. 南京社会科学,2013(10):36-40,61.
- [6] 马克思,恩格斯.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7] 约翰·洛克. 政府论:下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6.
- [8] 毛加兴. 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批判及其人本经济学的建构理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革命[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4):71-76.
- [9] 马克思.《资本论》大纲: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7.
- [1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94.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
- [13] 谢维俭. “重建个人所有”之我见[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12):45-48,81-82.
- [14]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纪念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3.

[责任编辑 文川]